

基于马克思物质变换理论的民族地区生态减贫释疑

周伍阳 郑万军¹

(长江师范学院, 重庆 408100)

【摘要】: 民族地区最大的潜在优势是绿水青山, 最大的现实问题是贫穷。生态减贫何以可能? “绿水青山”何以转变为“金山银山”? 马克思物质变换理论既为之提供了理论之源, 也指明了其症结所在和基本进路。马克思物质变换理论的三层次逻辑分析发现, 生态减贫中马克思物质变换裂缝的存在阻碍了“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顺利转化, 导致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两难困境。新时代实现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 需要充分发挥制度、市场和文化优势不断推进生态减贫的理论与实践创新, 及时弥补马克思物质变换裂缝, 破解民族地区生态减贫的困境, 促进“绿水青山”顺利变成“金山银山”。

【关键词】: 生态减贫 马克思物质变换裂缝 民族地区

【中图分类号】: D6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6924(2020)11—0033—07

一、引言: 民族地区生态减贫何以可能?

民族地区最大的潜在优势是绿水青山, 最大的现实问题是贫穷。一方面, 绿水青山是民族地区的基本风貌和最大优势。广义而言, “绿水青山”不仅仅包括随处可见的山水林田湖草等自然资源, 以及“白山黑水”“大漠飞沙”等独特的地貌, 而且包括历史遗迹、田园村落、野生动植物等丰富的生态资源以及清新空气、适宜气候等优良的生态环境。我国民族地区大多具有良好的生态基础、丰富的自然资源、多样化的立体气候以及独特的地质地貌, 是自然生态资源与文化资源的富集地, 同时又是涵养水源、保持水土和维护生物多样性的生态环境保护区; 另一方面, 大多民族地区区位条件较差, 生态环境脆弱, 自然灾害频发, 而且基础设施落后、人力资本投入不足、社会文明程度偏低, 资源开发难度较大, 经济发展落后, 贫困问题严重。同时, 一度不当的粗放型发展方式不仅弱化了民族地区既有的生态优势, 也加剧了民族地区潜在的生态风险。

民族地区的生态减贫何以可能? 即如何把我国民族地区的“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 生态减贫旨在扶贫减贫与生态环境改善的有机结合, 将“绿水青山”的自然生态价值转化成“金山银山”的经济社会价值, 实现区域绿色发展与可持续减贫的双赢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 民族地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两山”理念, 实施生态环境治理、精准脱贫的攻坚战, “通过生态保护脱贫一批”“探索一条生态脱贫的新路子”^[1], 力图将自然生态资源、文化资源转化为发展优势, 以实现脱贫攻坚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双赢”目标, 为民族地区如期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一个民族也不能少”的第一个百年

作者简介: 周伍阳, 博士, 长江师范学院地方政府治理研究中心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 贫困治理、生态治理; 郑万军, 博士, 长江师范学院地方政府治理研究中心教授, 重庆市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协同创新团队负责人, 主要研究方向: 基层治理、贫困治理。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供给侧改革背景下武陵山片区精准扶贫的长效机制研究”(17XJC790018);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南少数民族传统村落振兴中的社会风险防范研究”(18BMZ087); 重庆市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协同创新团队项目

奋斗目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民族地区在 2020 年实现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彻底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的目标，但其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生态环境脆弱、生态安全压力大的短板仍将长期存在。与此同时，生态减贫实践探索中也暴露出生态扶贫项目开发行政化、资金来源单一化、产业业态同质化等诸多难题^[2]。

后脱贫时代民族地区仍要持续推动生态减贫项目、提高生态减贫效能、促进“两山”高质量转化。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深入挖掘马克思物质变换的生态思想基础，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立场下，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生态减贫理论与实践创新来弥补马克思物质变换裂缝，把民族地区建设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推动中华民族走向“共建美好家园、共创美好未来”的命运共同体，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二、生态减贫的马克思物质变换理论逻辑

“物质变换”这一概念最早是由德国生理学家西格瓦特于 1815 年提出，具体指的是生命有机体与周围发生的诸如呼吸之类的物质交换，1842 年德国农业化学家李比希把这一概念扩大到阐释自然界无机物质和有机生命物质之间的物质交换过程。马克思立足科学的唯物史观，从物质资料生产是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基础这一客观事实出发，把西格瓦特和李比希的“物质变换”这一自然科学概念延伸到社会科学领域，提出人与自然层面物质变换是人类将有目的的活动加之于自然并使得自然产生符合人类自身需要改变的过程^[3]，社会层面物质变换是商品交换、消费的价值实现过程，形成了完整的从自然、人到社会的三层次物质变换理论。生态减贫是通过人的劳动主动改造自然环境、利用生态资源、开发生态产品以减缓人类贫困的活动，主要是通过生态修复、生态补偿、生态移民以及实施生态工程、发展生态产业等手段把“自然生产力”转化为“社会生产力”。马克思物质变换理论是认识人、自然与社会相互关系及其一般性规律的重要理论工具，生态减贫是内嵌于马克思物质变换理论规律并受其制约的，民族地区要实现“绿水青山”到“金山银山”的转变、达到生态保护利用与扶贫减贫的“双赢”目标，需要深入理解马克思物质变换理论规律并掌握生态减贫的理论逻辑。

1. 自然层面物质变换的生态资源价值形成源泉

自然层面物质变换是马克思物质变换理论的第一层次。它指的是自然生态系统有机物、无机物等自身本来就客观存在的物质变换，即自然界的自我循环，这也是“物质变换”这一概念的本来含义。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五章中以“铁生锈、木腐朽”等自然现象为例来说明自然层面物质变换是自然生态系统伴随着自然界物质循环、能量流动和信息传递的自我循环过程。作为体现自然生态系统生物属性的自然层面物质变换，具有内在的存在性与客观的规律性：人类自身就是以自然界生物形式存在，本身就属于自然层面物质变换的一部分，“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4]人类理所当然受到自然层面物质变换规律的制约，需要从外部世界获取生活资料并维持生存，并在此过程中排放废弃物到外部世界，离开自然层面物质变换的人类是无法维持生命存在的。

生态资源是生态减贫得以顺利进行的物质基础，它作为人类潜在的劳动对象，通过自然层面物质变换来形成价值源泉。习近平总书记以“两山理论”为核心的生态文明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物质变换理论的继承与发展，“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生态财富，又是社会财富、经济财富。”“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自然价值和增值自然资本，就是保护经济社会发展潜力和后劲，使绿水青山持续发挥生态效益和社会经济效益。”^[5]生态减贫是自然层面马克思物质变换理论在中国扶贫开发中的应用，习近平总书记“两山理论”不仅确认“绿水青山”能以生态资源形式客观存在的自然价值，并且强调这种客观的自然价值就是生态资源的价值源泉，自然层面物质变换产生了不以人为尺度的、自然本身固有的自然价值，当然生态资源自然价值也离不开人的劳动来实现。

2. 人与自然层面物质变换的生态减贫价值转化途径

人与自然层面物质变换是马克思物质变换理论的第二层次。劳动起到了沟通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中介作用，马克思认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6]这表明劳动首先是作用于自然、专属于人自身的活动，是人与自然间物质变换得以进行的前提，同时作为人与自然间物质变换中介的劳动具有双重属性，并受到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的双重制约：一是自然生态属性，劳动会受到诸如地理、地质、气候、气象、水文、生物等自然生态规律的影响；二是社会文化属性，劳动产品生产还要受到人类社会劳动分工、经济发展水平、财富分配、意识形态、文化习俗等多方面社会规律和制度的制约。

生态减贫是人类通过劳动作用于自然、把生态资源自然价值转化为使用价值的活动，这是一个“变与换”的双向物质变换过程。当然，人类在物质变换的双向过程中绝非消极被动地适应自然、顺从自然，还会积极主动地认识和掌握自然规律、社会规律，通过具体劳动这种人的主观能动性活动来改造自然、改变自然资源的原始形态，以满足人类生产生活的多重需要并创造使用价值。因此，生态减贫要实现从“绿水青山”到“金山银山”的价值转化，离不开人与自然层面有意识的双向物质变换活动，同时我们还要认识到人与自然层面物质变换既可能促进自然界的良性循环，也可能破坏自然界的正常物质变换，这取决于人类对客观规律的把握以及劳动改造自然界的尺度。如果人类活动背离了人与自然层面物质变换客观规律，对大自然只讲索取不讲投入、只讲利用不讲保护，那么“绿水青山”也会变成“荒山秃山”“穷山恶水”。

3. 社会层面物质变换的生态减贫价值实现过程

社会层面物质变换是马克思物质变换理论的第三层次。它指的是人与人之间物质的相互交换，主要包括社会经济活动中的商品交换。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商品交换、消费关系入手，认为社会层面物质变换在早期表现为“以物易物”的劳动物品交换，随后演化为以货币为媒介的、以商品所有权变更为目的的商品交换并通过消费使得商品使用价值消失的过程。从本质上而言，社会层面物质变换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多种有用劳动产品之间相互交易、交换的过程，“这一整套交换行为，从使用价值来看，是物质变换，从价值本身来看，则是形式变换。”^[7]社会层面物质变换是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作用结果，生态资源的自然价值要通过人类劳动转化成产品才能成为具有交换价值的交换对象，而这种交换价值是生态资源自然价值得以实现的根本。

以生态减贫的物质变换过程为例，“绿水青山”的自然价值经历了从自然层面物质变换到人与自然层面物质变换、再到社会层面物质变换的过程，即把生态资源转化为生态产品、再到生态商品的过程，而生态产品必须要以“交换、消费”才能得以实现其价值。这里的生态产品既包括作为“不费资本分文”的自然产品，比如清新空气、清洁水源、宜人气候等公共产品，也包括经过人类劳动改造过的私人产品，比如有机蔬菜瓜果等生态农产品，还包括名胜古迹、传统村寨等物质文化遗产以及防护林、水源地、湿地等提供生态系统服务的准公共产品。无论什么形式的生态产品都是通过“交换、消费”来完成社会层面物质变换，这个价值实现过程蕴含着买卖分离、对立的矛盾，即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有无法实现的危机。特别是在生态产品价值属性多样、生态资源产权不清等外部条件制约下，生态产品可能出现市场价格扭曲、销售渠道不畅、生态贡献与生态回报不相称等价值无法实现的风险，而每一次风险都可能带来自然资源和人类劳动财富浪费以及生态环境被破坏的危机。

三、民族地区生态减贫的马克思物质变换裂缝

马克思物质变换理论揭示生态减贫是通过劳动把生态资源转化为生态产品并在社会层面物质变换中完成商品交换、实现商品价值的过程。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度“重经济发展而轻环境保护”的“唯 GDP 论”以及“重经济增长数量而轻经济增长质量”的粗放型发展方式盛行，民族地区受到经济相对落后、区域发展不平衡、市场发育程度低、生态系统复杂、文化异质性强等因素的制约^[8]，再加上工业化、商业化、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民族生态文化的丢失以及非生态化生产消费方式的蔓延，生态减贫还受限于脱贫攻坚战中的压力型行政管理体制，产生了物质变换无法顺利进行的“物质变换裂缝”，从而阻碍了“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导致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两难困境。

1. 资本逐利的无序性破坏了生态资源

自然层面物质变换受到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客观规律作用，这也是人类劳动需要遵循的自然法则，否则就会打破自然界生态平衡的物质变换过程并引发自然层面的物质变换断裂，从而破坏生态资源的自然价值。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下资本逐利的逻辑是获取交换价值并尽可能多的占有剩余价值和超额利润，而不是满足人们生产生活需要的使用价值，这表现为尽量节省生产费用并无偿接受自然界“不费资本分文”馈赠，并将生产生活废弃物任意排向自然界。这种运作方式必然以获取最廉价、最丰富的自然资源且不受时空与数量限制为前提、以不计生态后果的资本增殖为生产目的，资本逐利的驱动使得生产过程过度关注交换价值与剩余价值，而不是使用价值与货真价实，其过程必然造成资源浪费。^[9]特别是工业化大生产把自然资源开采利用效率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大量廉价原材料投入到生产过程，生产流通时间不断缩短、生产能力无限扩大与自然资源承载力有限的矛盾日益尖锐，出现自然层面物质变换裂缝，这表现为环境污染、生态恶化、资源短缺和浪费等生态资源自然价值受损的风险。

民族地区生态扶贫项目开发中存在资本逐利、精英俘获、“扶强不扶弱”等问题，这破坏了生态资源的自然价值。在强势资本主导与地方脱贫时限压力下，有些地方政府把资源开发主导权让位于企业，重视“经济账”，引进高能耗、高污染的落后项目，忽视“环境账”，放松国家环保监管制度与政策；有些企业发展方式粗放、资源开发过度，把有限的资源当成“摇钱树”透支使用，突破所在区域、流域环境容量底线与生态保护红线，严重破坏了原本脆弱的生态环境，周边民众也容易因为环境污染患病而致贫、返贫。^[10]比如位于武陵山民族地区腹地的锰三角（重庆市秀山县、湖南省花垣县、贵州省松桃县），锰化工业的无序开发、滥采乱挖、乱排乱放导致山体破坏、河流污染，甚至出现电解液泄漏等重大安全生产事故，对土壤、流域和地下水造成不可逆的伤害，并且无论是矿山生态修复、渣场污染治理，还是企业排污技改与转停并转，都还需要地方财政巨额资金的投入，陷入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两难困境。

2. 二元经济体制下产业发展低端化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人口、粮食、水源等一系列资源不断向城市集中，城乡分割、工农业分离的二元经济体制特征日趋明显。马克思曾这样描述，“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自然条件。这样，它同时就破坏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工人的精神生活……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11]“大工业和按工业方式经营的大农业一起发生作用。如果说它们原来的区别在于，前者更多地滥用和破坏劳动力，即人类的自然力，而后者更直接地滥用和破坏土地的自然力，那么，在以后的发展进程中，二者会携手并进，因为产业制度在农村也使劳动者精力衰竭，而工业和商业则为农业提供使土地贫瘠的各种手段。”^[12]二元经济体制下的城市大规模工业与农村传统落后农业打断了人和自然层面的物质变换，并削弱了城乡产业发展的生态资源基础：一是城市人口大幅增加会导致环境污染、住房紧张、饮用水缺乏等问题，工人生产能力遭到破坏，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拉大，这人为的在土地与工人之间造成无法弥补的裂缝；二是农村人口不断下降，农村土地肥力得不到补充，土地生产力遭到破坏，远程贸易使得原产地商品所耗费的资源无法得到补偿，而消费地又产生了额外的物质变换剩余；三是部分城市工业向欠发达地区和农村转移，造成农村土地、水、空气等生态环境的破坏，这些因素的交织加剧了人与自然层面的物质变换断裂与两难困境的恶性循环。

民族地区产业结构呈现明显的“资源偏好”和“城市偏向”特征。脱贫攻坚背景下生态扶贫产业发展受制于城市资源性产业，生态产业呈现低端化、同质化倾向。其一，民族地区城市资源性产业尽管一定程度加速了当地城市化进程，增加一定就业岗位，但也把生态成本支付间接转移到资源开采区，导致位于偏远农村的资源输出区矿物过度开采并产生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安全隐患。其二，民族地区生态扶贫产业要求初始资金投入大，农村资源、人口的空心化使得产业普遍呈现“小、散、弱”的格局，产业生态、经济效益见效慢，产品市场竞争力、抗风险能力和就业带动能力不强，容易陷入低端重复、同质竞争，导致资源浪费、项目亏损、长期依赖输血和发展不可持续的困境。其三，生态资源、生态产业在某些领域的市场化不足与市场

化过度并存，资源配置的错位直接影响到生态产业发展潜力与人口生活质量。^[13]以生态旅游扶贫项目为例，民族地区由于区域发展不平衡以及基础设施、产业基础的薄弱，旅游资源开发初级，产品同质化严重，二元结构明显：比如凉山彝族自治州沿安宁河流域发展相对较快，而彝区、藏区明显滞后，许多优质文旅资源还未开发，2019年在建文旅项目仅占预计项目的25.97%，投资额仅占预计投资的13.28%，截至2019年12月，凉山州还有8个县A级景区数为零，生态旅游资源未得到利用。¹

3. 脱贫主体缺失制约内生发展动力

物质变换的顺利进行要求人的劳动遵循自然生态规律与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构建起人、自然和社会之间的多向协调关系，以形成经济社会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能量与信息的良性循环。如此，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与和谐共生才有可能，反之，物质变换断裂就会导致生态、经济乃至社会层面的危机。正如马克思所言，“忧心忡忡的穷人甚至对最美丽的景色都没有什么感觉，贩卖矿物的商人只看到矿物的商业价值，而看不到矿物的美和特征；他没有矿物学的感觉。”^[14]贫困人口在资本逐利、精英俘获和产业门槛的排斥下，面临生态资源价值受损、流失的困境，主体性缺失，内生发展动力不足，不仅难以珍惜、享受生态资源的自然价值，也难以参与、分享到生态产业的经济价值。

民族地区在资本逐利和二元经济体制约束下，生态资源分配不公，生态产业利益联结不紧，脱贫主体缺失，很容易使生态产业扶贫异化为产业扶富、产业扶企，这既不利于生态减贫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也会导致脱贫人口内生发展动力不足。首先，民族地区受制于二元经济结构，人力资本、自然资本、金融资本持续外流，留守的贫困人口生产技能传统，文化水平低，资金资源少，缺乏掌握生态生产技术、参与生态减贫产业的基本能力，难以分享政府支持的生态产业发展红利。特别是大量懂技术、有文化、有能力的乡贤离开农村，而生态减贫项目的实施需要这批具备一定创业能力、愿意服务乡民并能起到示范带头作用的乡贤来推进、带动；其次，民族地区贫困人口受制于民族文化的衰落和传统观念的束缚，脱贫内生动力不足。民族地区多样性族群文化本身是生态减贫产业发展的重要资源，但随着资本逐利的冲击以及乡贤的不断离开，民族传统文化日渐衰落，维系乡村伦理秩序的精神文化纽带趋于断裂，留守贫困人口的民族文化认同感和心理归属感弱化，再加上现代化、市场化大潮的外来冲击，容易陷入文化与身份的自卑而丧失内生发展的动力，产生了依赖政府扶持补贴、滋生“等靠要”思想的“精神贫困”。因此，民族地区生态减贫产业要立足贫困人口主体性地位，激活人口内生发展动力，活化利用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以生态减贫项目开发与民族文化保护利用的协同发展来助推可持续脱贫。

四、新时代民族地区生态减贫的进阶

新时代民族地区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并及时弥补物质变换裂缝，不仅要遵循马克思物质变换理论的客观规律，超越资本逻辑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发展道路，还要在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中更好地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释放市场经济活力、激发民族文化创造力，不断推进生态减贫的理论与实践创新，促进物质变换的顺利进行和“两山”的顺利转化，破解民族地区生态减贫的困境。

1. 依靠制度优势夯实民族地区生态减贫的组织基础

马克思把物质变换裂缝的根本原因归结到资本主义制度的逐利性与反生态本质，这是破坏人类社会生态-经济规律、引发人类贫困与生态危机的根源，而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途径是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建立自由人联合体的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民族地区弥补物质变换裂缝的根本制度保障。正如西方有机马克思主义学者小约翰·柯布先生所言，“比起欧美国家，中国实现生态文明的前景更令人乐观”“世界上只有中国共产党把消除贫困、生态文明建设纳入执政的重要议题，并作为基本国策加以推行”。^[15]2017年脱贫攻坚战打响以及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脱贫攻坚、乡村振兴要全党抓，五级党委书记亲自抓。2020年后推进“五级书记”从抓脱贫攻坚到抓乡村振兴的有机衔接，建立省市县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推进生态减贫、乡村振兴的组织机构，这是民族地区生态减贫项目可持续发展的组织保障。

民族地区生态扶贫项目是在上级单位、驻村干部、村两委带领贫困户和其他村民组织实施的，参与项目的贫困户存在发展能力不足、内生动力缺乏等问题，一旦驻村干部撤走，生态扶贫项目的可持续性就会受到挑战。因此，民族地区要在深刻领会、准确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扶贫重要论述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精神实质的基础上，充分运用好驻村干部、第一书记、对口帮扶单位等多方面力量，继续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以党建引领来提升生态治理、贫困治理的领导能力，夯实民族地区生态减贫与乡村振兴的组织基础。

2. 发挥市场优势创新民族地区生态减贫的产业形态

马克思认为物质变换裂缝产生的直接原因是城乡分割与工农业分离的二元对立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真正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体制。民族地区生态减贫在遵循马克思物质变换规律基础上，既要继续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创新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做大做强新型村级集体经济，还要借鉴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手段促进城乡间、产业间的融合发展。民族地区要把生态作为城乡融合共生的关键点，推动城乡自然空间的多维融合，构建城乡一体的生态产业链，优化城乡融合共生环境，健全“三产融合”与城乡融合共生机制，这也是弥补物质变换裂缝、创新生态减贫产业形态的重要举措。^[1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打好脱贫攻坚战要“发挥农村生态资源丰富的优势，吸引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向乡村流动，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带动贫困人口增收”。^[17]民族地区生态减贫产业要实现“三产融合”、城乡融合共生的关键是依托村级集体经济合作组织，推动包括自然资源在内的生产要素在城乡间、产业间实现自由流动和平等交换，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首先，要建立自然资源资产股权化的集体经济产权交易平台。民族地区村级集体经济组织要对生态资源、矿产资源以及具有乡土文化价值的人文资源作全面普查摸底，探索集体经济的股权化实现形式，对农民承包地、山林地、宅基地等确权颁证并展开市场化产权交易试点，通过产权市场交易发现自然资源的市场价值，让民族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人文景观资源成为发展生态减贫产业、获取集体财产收益的物质基础。其次，要健全对接城镇资源下乡的村集体经济合作社。民族地区村级集体经济合作社在接受城镇资源的辐射中，既要坚持公有制基础以及农民主体地位，又要推动城乡土地、资金、人才、技术等生产要素的跨界集约配置和市场化优化组合，提升自然资源等要素的市场配置效率，激发农村“三产”融合发展的活力，拓宽农户就业增收渠道，创新民族地区生态减贫产业形态。

3. 挖掘文化优势激发民族地区生态减贫的内生动力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指出民族文化是不同民族与各地方精神层面交往而得出的直接产物，兼具物质依赖性、相对独立性与巨大能动性，是社会有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地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文化观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视优秀民族文化在中华文化格局中的多元共生作用，将活化利用优秀民族文化与生态减贫有机结合，形成生态、生计与生命和谐共生、互惠耦合的生命共同体，提升少数民族人口文化自觉、文化自信与文化自强意识，激发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激活民族地区绿色发展能力与脱贫人口内生动力。

民族地区不仅有大量资源外流的“物理形态空心村”，还是乡土文化断流的“文化空心村”，文化不仅是修复民众自信心的关键动力，也是乡村产业发展的重要资源，生态减贫实践要让优秀民族文化在激活脱贫人口内生动力、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中发挥出重要作用。其一，要挖掘民族文化资源蕴涵的生态价值，培育脱贫人口生态发展意识。少数民族民众在长期的生存发展中形成了一套敬畏生命自然、保护生态环境、珍惜野生动植物的生态伦理观念和传统生态文化，民族传统生态文化既是少数民族群众内在持久的信仰信念，也对人的行为起到潜移默化的约束引导作用，这有利于增强脱贫人口生态发展意识、提升脱贫人口内生发展能力。其二，要强化民族传统生态文化的保护利用，提升脱贫人口生态减贫的产业发展能力。民族传统生态文化既是民族文化的重要形式，也是少数民族群众固有的生产生活方式，具有独特、不可复制的生态价值、经济价值与景观价值。民族地区要发挥区域特色生态景观和民族民俗文化的独特优势，促进民族传统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把生态减贫实践与脱贫人口的生产生活紧密结合，从根本上提升脱贫人口产业发展能力。比如西南地区高山梯田、侗族地区“稻

鱼鸭”共生系统等传统生态农业，在涵养净化水源、实施旅游扶贫、带动农户增收方面至今仍发挥着重大的作用。其三，要重视优秀民族文化的治理价值，打造包括少数民族人口在内的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优秀民族文化作为乡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通过文化浸润到人的观念，成为民族地区治理的精神基础。我们要让优秀民族文化与少数民族人口的生态道德、生态伦理、生态习俗一起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以更好发挥自然生态资源、文化资源在生态减贫中的优势，推动民族地区正在进行的乡村振兴战略和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生态环境保护、生态资源利用与扶贫减贫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参考文献:

- [1]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习近平扶贫论述摘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8:67.
- [2]郑万军, 周伍阳. 绿色减贫助推民族村寨产业振兴的逻辑与路径[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04): 57-62.
- [3]王草, 李成勋. 我国新发展路径的战略指向:一个马克思人与自然物质变换视角的分析[J]. 当代经济研究, 2020(02): 88-96.
- [4]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4:52.
- [5]习近平. 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J]. 求是, 2019(03):4-19.
-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207-208.
-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0:143.
- [8]姚树洁, 王洁菲.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经济发展与反贫之路[J].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19(06):3-16.
- [9]夏承伯. 资本逻辑、物质变换与马克思生产力论的生态意蕴[J].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17(12):101-105.
- [10]李俊杰, 吴宜财. 民族地区产业扶贫的经验教训及发展对策[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9(05): 139-143.
-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552-553.
- [12]马克思. 资本论: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4:919.
- [13]陈明星.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基本逻辑与实现路径[J]. 贵州社会科学, 2020(05):149-155.
-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9:126.
- [15]小约翰·柯布. 发展生态文明的中国优势[N]. 人民日报, 2015-08-21.
- [16]刘玉邦, 眭海霞. 绿色发展视域下我国城乡生态融合共生研究[J]. 农村经济, 2020(08):19-27.

[17]习近平. 在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J]. 社会主义论坛, 2019(10):5-9.

注释:

1 数据来源:贺盛瑜《加大民族地区旅游资源开发力度》, 华西都市报, 2020-05-22。